

# 引言

## 「從周邊看中國」到「歷史中國之內與外」

這本小冊子，討論的不是一個新問題，而是一個老話題。對「中國」/「周邊」的話題討論如此之久，直到最近仍是一個熱門題目，<sup>[1]</sup>說明它肯定還有懸而未決之處，依舊讓學界感

- 
- [1] 關於「中國/周邊」或者「內/外」，自從二十世紀上半葉若干題為「中國疆域史」、「中國民族史」、「中外交通史」的著作問世以來，研究論著非常多，這裏不一一舉例。最近，有關「中國」的著作仍然非常多，比如，許倬雲《我者與他者：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0）、葛兆光《宅茲中國：重建有關「中國」的歷史論述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）、《何為中國？——疆域、民族、文化與歷史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14）、王賡武《更新中國：國家與新全球史》（英文本：*Renewal: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*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13；黃濤中譯本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16）、許宏《何以中國：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》

到困擾。

我也感到困擾。十年前即2006年，當我們開始推動一個主題為「從周邊看中國」的研究計劃的時候，我的想法只是，一方面實踐胡適1938年在瑞士蘇黎世參加國際歷史學會時提出的，把日韓保存的有關中國史料作為「新材料」的想法，<sup>[2]</sup>另一方面想改變中國歷史與文化研究中「自說自話」的習慣，提供重新認識東亞和中國的多重視角與立場。<sup>[3]</sup>但近十年來我

---

(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4)、許倬雲《華夏論述：一個複雜共同體的變化》(台北：天下文化，2015；大陸簡體版改題《說中國》，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5)，以及今年(2016)的劉曉原《邊疆中國：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》(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16)、李零「我們的中國」系列四冊(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6)。

[2] 見胡適：“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”(新發現的有關中國歷史的材料)，收入《胡適全集》(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3)第36卷，頁631-637；現有鄭群中譯本，載《中國歷史評論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)第四輯，頁50-54。參看葛兆光《攬鏡自鑒：日本韓國所藏有關近世中國的史料》，原載《復旦學報》2008年2期，收入《想像異域：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)，頁3-25。

[3] 因此，從2007年以來，我們整理出版了《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》、《朝鮮漢文燕行文獻選編》和《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》(均為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0，2012，2015)等有關東亞和中國的域外漢文文獻，我本人也出版了《宅茲中國》、《想像異

也注意到，在有關「從周邊看中國」研究的評論中一直有一些質疑的聲音，在這些質疑中最關鍵的是：什麼是「周邊」？「周邊」是環繞現代中國東西南北的異國嗎？「從周邊看中國」是否仍然隱含了以中國為中心，其他國家為邊緣的中心主義？其中，最不容迴避的問題就是對「周邊」如何界定？簡單地說，如果按照現代中國國境，「周邊」當然只能是日本、韓國、蒙古、越南、緬甸、印度、俄羅斯等異國，但是，按照歷史上的王朝疆域或帝國版圖，那麼，除了歷史上相對穩定延續的漢族中國政治-文化共同體之外，<sup>[4]</sup>古代西方北方的匈奴、鮮卑、突厥、吐蕃、回鶻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滿洲，以及南方的濮、溪、洞、蠻等相當多的非漢族群種邊緣區域，是否也曾是歷史上「中國」的「周邊」？我們是否也應該從他們的立場、視角和文獻，在歷史過程中反觀「中國」？不過，由於這在中國大陸不是學術領域裏的歷史問題，而是政治領域中的現實問題，因此，這些年來我只能比較含糊地使用「周邊」這一概念。

---

域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)、《何為中國》(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14)等討論東亞及中國的有關論著，還組織召開了幾次有關「從周邊看中國」、「東亞海域」、「亞洲歷史與民族認同」的會議。

- [4] 必須鄭重說明，儘管這一共同體本身，也充滿了複雜的族群融匯與文化雜糅，而且它有時與王朝重疊，有時分處幾個帝國，有時候只是帝國內部一部分，但我仍然堅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「中國」。關於這一點，請參看第四章的討論。

可是，含糊終究只是權宜之策，如果不斷「打破砂鍋紋（問）到底」，不僅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現實的政治問題，可能也會涉及到更多具體的學術問題。比如說，如果按照現代國家的國境，這種「周邊」只是「外」，那麼，涉及「中國」與「周邊」的歷史研究，可能應當算在所謂的「中外關係史」領域；可是，如果按照傳統王朝的疆域，這種「周邊」可能還有「內」，那麼，涉及這種「中國」與「周邊」的某些歷史研究，就往往會在所謂「中國民族史」領域中；<sup>[5]</sup> 如果按照現代中國的國境，有些「周邊」可能是中國的「邊疆」，這一研究應當算在「邊疆史地」領域；但是如果按照傳統王朝的疆域，有些「周邊」在當時中國王朝之外，甚至與異域的歷史與文化關聯更深，因而不是「邊緣」（border）只是「之間」（among），<sup>[6]</sup> 有可能對它的研究應當劃在「區域史」或者「跨區域史」領域。假如我們承認歷史中國無論在疆域上、族群上還是文化上，都是移動的和變化的，那麼，「內」、「外」之際就常常會移形換位。正因為如此，我們不得

---

[5] 舉一個例子，有一部關於清代朝覲制度的研究著作，就認為邊疆民族朝覲納貢，與外國朝覲納貢，有「本質不同」，前者屬於「國內事務」，後者屬於「中外關係」，可是，這種國內國外的區分標準不是根據清代朝貢的歷史狀況來的，而是從現代中國國界內外來的。見張雙智《清代朝覲制度研究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10）「前言」，頁2。

[6] 這裏我借用了梁元生教授一部論文集的書名。見梁元生《邊緣與之間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8）。

不在「從周邊看中國」的研究之後，繼續推動「歷史中國的內與外」的研究，希望在這一研究中，不僅說明歷史中國的疆域、族群和文化的內、外變化，也試圖溝通過去分屬中外關係史、中國民族史(包括「邊疆民族」、歷史地理學(包括所謂「邊疆史地」、全球史(和區域史)的各種資料、理論和方法。

因此，無論如何，對「周邊」——其實反過來也就是「中國」——還欠一個清晰的界定和說明，下面，我就從「周邊」的重新認識說起。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